

冰心散文集

精华本

ICEHART'S ESSAYS
ICEHART'S ESSAY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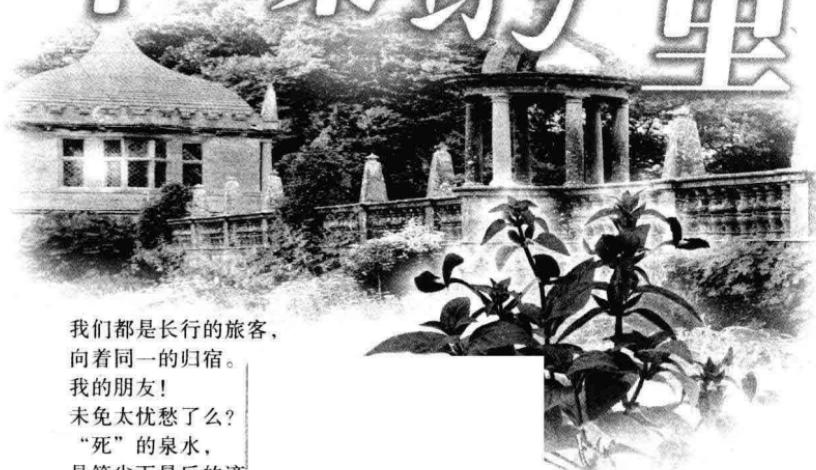
十字架的园里

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，
向着同一的归宿。
我的朋友！
未免太忧愁了么？
“死”的泉水，
是笔尖下最后的一滴



冰心散文集 精华本

十字架的园里



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，
向着同一的归宿。
我的朋友！
未免太忧愁了么？
“死”的泉水，
是笔尖下最后的滴

READ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美散文集/李丽琼主编. —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04. 9
ISBN 7 - 80208 - 004 - 5

I . 精... II . 李...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9853 号

书 名:精美散文荟萃——冰心散文集

主 编:李丽琼

责任编辑:孙 琳

封面设计:邓昌锦

出版发行: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 2 号)

邮 编:100733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武汉市昌隆包装彩印公司

字 数:2200 千字

开 本: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100

印 数:5000

印 次: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 - 80208 - 004 - 5 / I . 003

定 价:150.00 元(全套 10 册)

目 录

· 自传篇 ·

冰心自传	3
童年杂忆	5
我家的对联	12
我的大学生涯	15
在美留学的三年	23
我的父母之乡	29
我从来没觉得老	31

· 往事篇 ·

“破坏与建设时代”的女学生	35
一只小鸟	41
笑	42
法律以外的自由	44
宇宙的爱	46
石 像	48
我 + 基督 = ?	49
南 归	51
非完全则宁无（一）	74

非完全则宁无（二）	75
非完全则宁无（三）	76
十字架的园里	78
除夕的梦	80
新年试笔	82
到青龙桥去	84
五月一号	88
回 忆	91
我做小说，何曾悲观呢？	92
圈 儿	94

• 女人篇 •

我的母亲	97
我的教师	102
我的同学	106
叫我老头子的弟妇	110
我的朋友的母亲	114
张 嫂	122
我的朋友的太太	126
我的择偶条件	131
我的 奶 娘	134
《关于女人》再版自序	139
《关于女人》后记	141
我的 学 生	144
我最尊敬体贴她们	154
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	157
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	160
我的同班	164

我的房东	168
我的邻居	177
· 随想篇 ·	
山 中 杂 感	185
“无限之生”的界线	186
梦	189
闲 情	191
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	193
回忆“五四”	195
谈巴金的《随想录》	199
我的家在哪里？	203
我 请 求	205
开 卷 有 益	208
无士则如何	212
世 纪 印 象	215
我 咽 着 重 新 看 完 《国殇》	216
谈 孟 子 和 民 主	218
山 中 杂 记	220
寄 小 读 者	233

自 传 篇



冰心自传

我原名谢婉莹，1900年10月5日（阴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）生于福建省的福州（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）。1901年移居上海。父亲是当时清政府的海军军官，那时担任副舰长。

1904年，父亲任清政府海军练营营长，后来又任海军学校校长，我随父亲移居烟台。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，我特别喜欢大海，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前，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，全家又回到了福州。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，只在家塾里做过一个附读生，回到福州后，进村女子师范学校预科。

中华民国成立，我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，1913年，我又随家到了北京。

1914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，1918年毕业，进了协和女子大学，学的是理科，因为母亲体弱多病，就一心一意想学医。

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了，当时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当文书，写些宣传的文章，在“五四”革命浪潮的激荡下，我开始写一点东西拿到北京《晨报》上发表。由于过多的宣传活动，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，我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，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大学。

1923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，又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（Wellesley College）的奖学金，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。血疾复发，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。

1926 年我读完研究院回国，曾在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女子文理学院任教。

1921 年后，文学研究会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《超人》，诗集《繁星》；1926 年后，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《春水》和散文集《寄小读者》；1932 年，北新书局出版《冰心全集》。分集出版的有《往事》、《冬儿姑娘》等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1938 年我先到了昆明，1940 年又到重庆，因为生活需要，我又不愿用冰心的名字写文章，曾用“男士”的笔名写了《关于女人》，先由天地出版社，后由开明书店出版。

抗战胜利后，1946 年我到了日本。1949 年至 1950 年在东京大学（原帝国大学）教“中国新文学”课程。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，登在东京大学校刊上。

1951 年，我回到祖国后，写了《归来以后》等作品，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、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、散文集《冰心小说散文选》、《归来以后》、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、《樱花赞》、《拾穗小札》、《小桔灯》等。

1958 年又开始写《再寄小读者》。

1954 年以来，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1960 年第三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，1978 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。1979 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。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开始在《儿童时代》发表《三寄小读者》。

除了创作之外，我还先后翻译过泰戈尔的《园丁集》、《吉檀迦利》、《泰戈尔诗集》和他的短篇小说，穆·拉·安纳德的《印度童话集》，叙利亚作家凯罗·纪伯伦的《先知》，尼泊尔国王的《马亨德拉诗抄》，马尔他总统安东·布蒂吉格的《燃灯者》。

我的作品曾由外国翻译家译成日、英、德、法等国文字出版。

1980 年 6 月

（选自《冰心研究资料》）

童年杂忆

童年呵！
是梦中的真，
是真中的梦，
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。

——《繁星》

一九八〇年的后半年，几乎全在医院中度过，静独时居多。这时，身体休息，思想反而繁忙，回忆的潮水，一层一层地卷来，又一层一层地退去，在退去的时候，平坦而光滑的沙滩上，就留下了许多海藻和贝壳和海潮的痕迹！

这些痕迹里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。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，开朗的，首先是健康的。该得的爱，我都得到了，该爱的人，我也都爱了。我的母亲、父亲、祖父、舅舅、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、感情往正常、健康里成长。二十岁以后的我，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吹雨打，但是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，我就能够经受身外的一切。有了健康的感情，使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，虽然在螺旋形上升路上，是峰回路转的，但我们有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判断，来克制外来的侵袭。

八十年里我过着和三代人相处（虽然不是同居）的生活，感谢天，我们的健康空气，并没有被污染。我希望这爱和健康的气息，不但在我一家中间，还在每一个家庭中延续下去。

话说远了，收回来吧。

读 书

我常想，假如我不识得字，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阴，如何消磨得下去？

感谢我的母亲，在我四五岁的时候，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，把文字这把钥匙，勉强地塞在我手里。到了我七岁的时候，独游无伴的环境，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，打开了书库的大门。

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呵！我一跨进这个门槛，我就出不来了！

我的文字工具，并不锐利，而我所看到的书，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。但即使我读到的对我是些不熟习的东西，而“熟能生巧”，一个字形的反复出现，这个字的意义，也会让我猜到一半。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聊斋志异》，这里我只谈《聊斋志异》。

《聊斋志异》了真是一本好书，每一段故事，多的几千字，少的只有几百字。其中的人物，是人、是鬼、是狐，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，每个“人”都从书上站起来了！看得我有时欢笑，有时流泪，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。不幸的《聊斋志异》，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，把洗澡水都凉透了，她气得把书抢过去，撕去了一角，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，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，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。

此后是无论是什么书，我得到就翻开着。即或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张纸，哪怕是一张极小的纸，只要上面有字，我就都要看看。我记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，我要求我的老师教给我做诗。他说做诗要先学对对子，我说我要试试看。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，是“鸡唱晓”。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“鸟鸣春”，他大为喜悦诧异，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的《送孟东野序》。其实“以鸟鸣春，以雷鸣夏，以虫鸣秋，以风鸣冬”这四句话，我是在一张香烟画的后面看到的！

再大一点，我又看了两部“传奇”，如《再生缘》、《天雨花》

等，都是女作家写的，七字一句的有韵的故事，中间也夹些说白，书中的主要角色，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。如《再生缘》中的孟丽君，《天雨花》中的左仪贞。故事都很曲折，最后还是大团圆。以后我还看一些类似的书，如《凰双飞》，看过就没有印象了。

与此同时，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说部丛书”，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迭更斯的《块肉余生述》，也就是《大卫·考伯菲尔》，我很喜欢这本书！译者林琴南老先生，也说他译书的时候，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，而“笑啼间作”。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当可怜的大卫，从虐待他的店主出去，去投奔他的姨婆，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，我一边流泪，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，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，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！有时被母亲看见了，就说：“你这孩子真奇怪，有书看，有东西吃，你还哭！”事情过去几十年了，这一段奇怪的心理，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！

我的另一个名字

我的另一个名字，是和我该爱而不能爱的人有关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姑母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姑母，只从父亲口里听到关于她的一切。她是父亲的姐姐，父亲四岁丧母，一切全由姐姐照料。我记得父亲说过姑母出嫁的那一天，父亲在地上打着滚哭，看来她似乎比我父亲大得多。

姑母嫁给冯家，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时候，曾跟我的父亲到三官堂冯家去看我的姑父。姑母生了三男二女，我的二表姐，乳名叫“阿三”的，长得非常的美。坐在镜前梳头，发长委地，一张笑脸红扑扑的！父亲替她做媒，同一位姓陈的海军青年军官——也是父亲的学生——结了婚，她回娘家的时候，就来看我们。我们一大家的孩子都围着她看，舍不得走开。

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，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，个个都会吹弹歌唱，墙上挂的都是些箫、笙、月琴、琵琶之类。父亲常说他

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。

我生下来多病。姑母很爱我的父母，因此也极爱我。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，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，作为寄女，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，叫“珠瑛”，我们还买了一条牛，在吕祖庙放生——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！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，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，叫做“过关”。这“关”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，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，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“恭逢其盛”！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，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，围上红缎“桌裙”，点蜡，烧香，念经，上供，一直闹到下午。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“关”，让我拉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，从“关门”里走过，道士口里就唱着“XX 关过啦”“XX 关过啦”，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，然后把这纸门烧了，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，收拾起道具，回去了。

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——福州是山的城市，城内有三座山，乌石山，越王山（屏山），于山，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，就想到福州！

吕祖庙是什么样子，我已忘得干干净净，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，突兀地倚立在山上，十分奇特。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“桃瓣李片”，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，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。

和我的这个名字（珠瑛）有联系的东西，我想起了许多，都是些迷信的事，像把我寄在吕祖名下和“过关”等等，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，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，反正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，并不麻烦他们自己，也就算了，“珠瑛”这个名字，我从来没有用过，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。

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，一时兴起，曾想以此为笔名，后来终究因为不喜欢这迷信的联想，又觉得“珠瑛”这两个字太女孩子气了，就没有用它。

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，我若是不想起，提起，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
父亲的“野”孩子

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侯，母亲总是笑骂着说：“看你的脸都晒‘熟’了！一个女孩子这么‘野’，大了怎么办？”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：“你的孩子，大了还会野吗？”这时，母亲脸上的笑，是无可奈何的笑，而父亲脸上的笑，却是得意的笑。

的确，我的“野”，是父亲一手“惯”出来的，一手训练出来的。因为我从小男装，连穿耳都没有穿过。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，脱下男装后，我的伯母，叔母都说：“四妹（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）该扎耳朵眼、戴耳环了。”父亲还是不同意，借口说：“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，有一颗聪明痣。把这颗痣扎穿了，孩子就笨了。”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，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！

不但此也，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，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，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一瘸地走，父亲就埋怨母亲说，“你又给她小鞋穿了！”母亲也气了，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：“你会做，就给她做，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，我也不管！”父亲真地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，母亲反而笑了，把剪刀夺了过去。

那时候，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，他一下班，我一放学，他就带我出去，骑马或是打枪。海军学校有两匹马，一匹是白的老马，一匹黄的小马，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。我们总在黄昏，把这两匹马牵来，骑着在海边山上玩。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，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，跟在后面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，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，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，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，跟在后面的父亲，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。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，给孩子让出路来。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，轻轻地拍了几下。

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，白马死了。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。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，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。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。

父亲还教我打枪，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。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。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，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，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！

烟台是我们的！

夏天的黄昏，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边，他不换便服，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地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，这样，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。

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海坐下，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，红霞满天。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，那是芝罘岛。岛上的灯塔，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。

有一天，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，半天没有言语。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，说：“爹，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么？烟台海边就是美，不是吗？”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，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。

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：“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，何止一个烟台？你没有去过就是了。”

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。

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，接着说：“比如威海卫，大连湾，青岛，都是很好很美的……”

我说：“爹，你那时也带我去看一看。”父亲拣起一块卵石，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，一面说：“现在我不愿意去！你知道，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，威海卫是英国人的，大连是日本人的，青岛是德国人的，只有，只有烟台是我们的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！”

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怒到这个样子。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，一个平等的对象，在这海天辽阔，四顾无人的地方，倾吐出他

心里郁积的话。

他说：“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？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呵。这里僻静，海滩好，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，划船，打靶等等。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，大连，青岛，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。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！”

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：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二副。开战的那一天，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，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！炮火停歇以后，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，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。

“这些事，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，永远挂在我的眼前，这仇不报是不行的！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，死的人，赔的款，割的地还少吗？

“这以后，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，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。英国，日本，法国，意大利……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！你不到外国，不知道中国的可爱，离中国越远，就对她越亲。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，不振兴起来，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。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，上头腐败得……”

他忽然停住了，注视着我，仿佛要在他的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。他站起身来，拉起我说：“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一般父亲带我出去，活动的时候多，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，还是第一次！在这长长的谈话中，我记得最牢，印象最深的，就是“烟台是我们的！”这一句。

许多年以后，除了威海卫之外，青岛、大连，我都去过。英国、日本、法国、意大利……的港口，我也到过，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。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！

但是，“烟台是我们的”，这“我们”二字，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，还特别包括我和我的父亲！

1981年4月

（选自《我的故乡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）